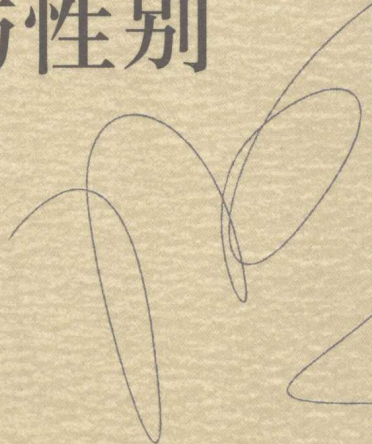


培文书系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陈顺馨 著

中国当代文学 的叙事与性别

增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陈顺馨 著

中国当代文学 的叙事与性别

增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增订版)/陈顺馨著.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12095-8

I. 中… II. 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9196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增订版)

著作责任者: 陈顺馨 著

责任编辑: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095-8/I·090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305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2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丛书主编：洪子诚 丛书策划：高秀芹

序 一

谢 冕

陈顺馨来自香港，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她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却迷上了燕园。她在这里修完了硕士课程，紧接着又开始博士学位的攻读，她与这所大学有着不可割断的精神纽带。

对于希望超越世俗而在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们来说，北大是一个磁场。这磁场吸引着海内外诸多学人，他们可以放弃很多机会而朝圣般来到这里，总为求得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北大对人的启示，可以集中到最简单的一个点上，即人们被告知，尽管人不能离开物质条件而生活，但精神却远不是苍白的；物质的拥有者可能贫乏，而精神的拥有者却可能富有。这里的空气弥漫着某种庄严感，那种民主精神与真理探求相联结的目标，始终鼓舞着人们前赴后继地奋斗。

陈顺馨就是这样被无形的磁力的吸引而来到了这里。她已经成为北大这环境中理所当然的一员。从做人到治学，她都按照这里提供的条件和标准塑造自己。陈顺馨做人认真，做学问也认真，锲而不舍的执著和投入，使她在学海遨游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对于像她这样生长在另一种社会、又受到另一种教育熏陶的人，能够读通中国大陆这本书、特别是能够读通大陆当代文学这本书是非常不易的。海外专攻中国文、史、哲的汉学家虽曰掌握了中文，但真正能够读通当代中国这本书的也并不多。他们多半从社会政治层面、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特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这里独特的人文景观，这确有一定道理，却往往流于世俗的偏见而难于深入。陈顺馨寒窗数载，在燕园苦读的就是这样一本“中国书”。据我观察，她的学习和思考均取得了异于他人的进步。

中国社会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诡奇多变，这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所有人来说，都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陌生感。别说这是一本丰富无比的活书，有的就是一个词、一个概念的领会，也会造成极大的理解的困难，但这本书不管有多么艰深，陈顺馨硬是顽强地读了进去，而且竟

然读出了其中的深意，她的确也为此付出了异于他人的努力。

陈顺馨为学的勤苦是突出的，她有一股穷根究底的韧劲。她精通英语，可以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把握学术的最新信息。她的这本著作中关于外国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史观念的评价，都具有表达该学科历史沿革及前沿状态的性质。女性主义批评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实践甚少，陈顺馨集数年努力，致力于此而成绩斐然。

她的好处是对理论不浅尝辄止或浮光掠影，而是一旦涉及便要把脉络理清，运用时不盲目，且崇尚实际而不务空谈，没有时下流行的浮躁与夸饰的陋习。这些特点从她使用的题目便可看出，如“女性主义批评与文本解读”，把理论阐释和应用紧密地与具体的文本的解读方面相联系。书中论及女性主义批评，多用实例予以比较的分析，如对曹禺、赵树理两位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极女性的分析比较；对凌叔华的《酒后》与丁西林改编的《酒后》的分析比较等，均展现出其追求实效而不喧哗的为学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迄今已接近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已接近完备和进入成熟期。当代文学研究的确深入并取得了成效，但近年来逐渐产生了一种倾向，即一般论者热衷于追逐新潮而忘记历史。文章越做越“新”，也越做越飘浮。这一倾向构成了总体的失衡。要说新潮，陈顺馨所知可能不比他人少，但她不追求时髦，甚至从热闹场中拔足而起，回到被遗忘的“历史”中去。近年她对“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兴趣，就是这种“逆向而行”的表现。

这种与时尚的逆反是勇气和自信的证明，也是一位学者的坚定性和拥有独立意识的证明。当然，所谓“回到历史”并不是回到惰性或回到标准化的旧路上去，而是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这是可以而且应该是全新的观照，而断然排斥屈从于历史歧变奴性认同。本书关于十七年文学富有新意的论述角度，关于叙事话语与性别理论的研究，都表明陈顺馨的“回到历史”是一种新的占有，她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自信和独立是一位学者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验证。自信而不轻狂，独立而不专断，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境界，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庸折衷。不论求学还是治学，信心总是一种品质。若不自信则学业不会上进，若不自信也谈不上创造。独立意味着充分自主的判断力、论述方式，以及个人风格的形成。独立和创新互为因果，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不照搬他人的结论反过来为创造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同样，一位具有创造力的学者，无疑是一位受到强大自信心支持的学者。陈顺馨这本书当然是她学术生涯的起步，但我感到而且也希望她正健康地走向我们大家都向往的大目标。

陈顺馨在这所校园的数年生活，不觉间也染上了这个小社会特有的“呆气”——这是一种难以界定的品质，包括对学术和精神的专注、对校门外的社会的“无知”等等——她的好处是有很多这样的“呆气”。但她的缺点可能也在这里，即，她太拘谨，扎实和勤勉有余而活泼灵动略嫌不足。这是我在祝贺她的成绩之时而寄望于她的。

1994年7月17日

于北大畅春园

序 二

戴锦华

不想以“文如其人”的滥套来为阿馨作序，尽管在阿馨那里，这正是一个事实：她的文字一如她的为人，平实、饱满而深挚。但是这本并不极为丰厚的著作（当然，作为阿馨在大陆求学前四年的收获，它已足够的厚重）之于阿馨，只是她作为治学的一个角隅、一扇窗口罢了。

五年前，阿馨已逾而立之年，由繁华喧闹的香江来到北京，从师于洪子诚、谢冕先生，主修中国当代文学，由此进入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领域。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始，也是阿馨的追索与跋涉中的又一句段。早在80年代初，阿馨曾在欧洲的求学、游历中度过一段少年意气的“国际流浪女”时代，在荷兰的社会研究院获得了发展学的硕士学位。正是在这段求学与游历的岁月中，欧洲激进的学术氛围、女性生存的林林总总，与阿馨自己锐敏而内向的女性体验撞击，唤起了她极为自觉而清醒的女性意识。在她的回忆中，也正是在这段特定的经历中，她成为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之于阿馨，并不仅是一种视点、一种学术立场，甚至也不仅是一种信念。这与其说是一个标识，不如说是阿馨生命的一部分。一如她的为人，阿馨之为女性主义者，平实自信、坦坦荡荡、不矫情、不张扬，执著坚韧，却从不强加于人。她宽厚、温和，充满理解与背负的襟怀，但从不退缩、妥协。记得初识阿馨，是在1990年，我初返母校讲坛之时。课下，阿馨赠给我一册她在香港创办的妇女杂志。杂志的名称令我生疑——《女流》。“女流之辈”，无疑是一种蔑称，一种委琐低微的女性形象。但当我读过这本杂志，特别是当我和阿馨相交、相知日深之后，我才深切地体味到，这名称作为一本女性主义的杂志，是如此的贴切。这是一种坦荡的性别的自我确认，一种不无颠覆意味的、女性形象的重写。不错，正是一些“女流”，一些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并欢畅的女流，一些反抗男权压迫、反抗性别歧视、崇尚姊妹情谊的女流。凡与阿馨相处、相交过的女性，自会深切地体味到，姊妹情谊在阿馨那里，不仅是一种女性的乌托邦，

亦不仅仅是一份理想的倾注,甚至不仅仅是一种自觉的实践;那是一种生存方式,一份无终止的无怨的奉献、无悔的承担。

自欧洲返回香港的岁月中,与其说阿馨在继续她的学术研究,不如说她是在实践着她在求学生涯中确认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理想。是她和志同道合的女友们首创了香港最重要的妇女组织之一“新妇女协进会”(妇进)。阿馨自1986年起,到她前来北京寻找学习的道路之前,任妇进主席。这是些热情而平实的年轻女人。白天,她们和别人一样,作为记者、社工、教师、编辑或公司职员,为事业、为生计而奔波。入夜,当劳碌了一天的人们涌向繁华香江的娱乐场所、或回到自己的安乐窝时,她们便齐聚在自己租下的简单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开始了她们所倾心的工作。这是不能给阿馨和她的朋友们带来任何收益与“利润”的“第二职业”,相反,阿馨就曾到处奔走为妇进争取必要的经费。这不是任何一种机构化的组织,然而,它却是一个稳定而牢固的团体。对女性命运的共识与关注、对女性理想的执著,使之成立;对这一理想的热情与奉献使之生存。自1984年起,十年间,她们创办了重要的妇女刊物《女流》;关注于香港各界妇女的现状与问题,关注于香港形形色色传媒系统对女性形象的勾勒与表述;她们不时对各类机构与组织提交她们对性别歧视及其表述的抗议,间或前往有关机构抗议、示威,在她们的直接干预与参与下,港府被迫面对有关法律条文中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条款;她们设立了热线电话,与社会各阶层妇女倾谈;她们亦办讲座、训练班,推行基层教育,并搞调查研究,出版报告;她们建立了全香港最完备的妇女研究与妇女现状的资料中心……其间的种种艰难、坎坷,非个中人无法历说。阿馨则远非历数自己功绩之人。只是当她们刚庆祝建会十周年之后,现任主席的彩云突然发现了胃癌,胃切去了大半,阿馨谈及此事,轻叹一声,“都是作这个主席,说不出有多累……”1993年,在港参加学术会议,时值阿馨返港,引我见了新妇女协进会的中坚们,一群如此活泼、投入而朴素的年轻女人。她们都分别有着成功的事业或和谐的家庭。我们的话题热烈而多变,由香港、大陆妇女的现状到我和芳子引为“知音”的“硕大银耳环癖”,从女性研究到妇进活动中的趣事:诸如她们前去抗议一家广告公司的充满性别歧视的广告,公司经理答曰:那些广告全是女人制作的。一阵笑叹。她们帮我更深入地理解了阿馨,她的内心,她的情怀,她的执著与宽容。

从任何角度上说,阿馨都不“像”一个“妇运领袖”,她总是那样平和、从容、宽厚而宁静,她会极其耐心、聪敏而富于理解地倾听,绝少插话或“宣言”。当她开口时,总是那样简洁、诚挚。只是偶尔略略提高的声调会露出她内心的波澜,但这种情形却绝少出现。难见她口中臧否人物,对显见的敌意与冲突也只是淡然一笑。在北大的校园里,她似乎极为和谐地成为众多勤奋的研究生中的一个:朴素的衣着,简单的双肩背,一辆自行车,匆匆地往返在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间。她最初抱着体验大陆生活和学习中文的愿望来到北京,很快便为文学理论、当代文学与学术研究所吸引,立刻以阿馨式的投入进入了这一新的领域。而她的硕士导师洪子诚先生的人格、学品令她敬佩,她愿意像他那样投入这寂寞但有意义的事业。间或与阿馨谈起这些,除了北大特定的学术氛围,师长人格学术的魅力,另一个深刻的原因,也是我们间的共识是,女性主义不应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社会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女性解放的现实必然伴之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不仅是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抗议与改变,而且是对深刻内在于文化之中的男权文化的揭示、解构与重写。只有改变以歧视、甚至无视人类的一半为前提的文化性别等级,才有可能彻底解脱“解放妇女”、“新女性”作为“占领区的平民”、“解放了的黑奴”的历史命运。

然而,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一次历史的、针对历史的挑战。女性主义的学者和女性主义的作家一样,面临着女性写作的多重挑战与困境。必须一次再次地完成女性的“文化镜城”的突围,在反抗施之于女性的重重规范的同时,避免遭遇到在逃脱中落网的文化命运。与此同时,一如女性主义理论家、女性实验电影导演劳拉·莫尔维所指出的:“我们无法在男性的苍穹下另觅天空。”于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写作者,在批判“菲勒斯(phallus)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还必须面对与男性写作者共同使用的语言系统与学术规范。阿馨无疑深知这一切。但她仍以她的坚韧、执拗加入了这一文化战场。一如她从不渲染自己丰满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她也绝不张扬她的学术背景与优势。相反,她尊重仿效导师严谨、扎实的求知治学之道,正视、甚至夸张了她自己大陆生活经验与政治、文化经验的匮乏。于是,她大量选修各类课程的同时,阅读了数量浩繁的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作品及资料,同时大量精读了欧美学术理论论著的原文。阿馨开始了她的新的学术生涯,不是作为一次新人生历险与征服,而是再次倾全部身心投入了一次新的探索与追求。不久,我们便开始在各类学术刊物的女

性主义、或非女性主义的栏目中看到了她别具慧眼的论文。

在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女性主义批评无疑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但其中的女性主义,不是一种先在的预设,理论的俯瞰,而是在深刻的体认、细致的分析、翔实材料中呈现出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点。在阿馨平实、细腻的文风中,突出的不是论战色彩与雄辩的风格——一如人们对一个女性主义学者的想象,而是一份娓娓道来的从容、一篇篇以理服人的陈述。或许最能显示阿馨此阶段学术风格的,是她的长篇论文《当代“十七年”小说叙事话语与性别》。其中,她引入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叙事学、话语研究和性别分析理论,显示了她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更有价值的是,她以这些理论为激发点,将其细致地、创造性地应用于“十七年”中国当代小说之中,在详尽、深入的文本读解的基础上,揭示出写作者的不同性别如何在其叙事话语中呈现出微妙的差异。作为一个“男女都一样”的特定时代的文本生产,作为一个激越的“大时代”同声合唱的“不同声部”,阿馨并不试图依据任何先在的预设,从中发现类似于“性沟”或女性话语式的表述;相反,她是在对大量不同文本的分析、比较之中,发现在叙述者位置、叙事语调、叙述权威、叙事视点中男女作家作品中潜隐的性别倾向与性别痕迹。其中作者与性别同时浮现出“中性”文本的疆界、陷阱与囚牢。因此,阿馨将她的分析置于远为深广的特定社会语境中。更富于启示的是,她在对作家杨沫与孙犁的比较中,进一步确认了一种“跨性别视点”。这与她对凌叔华与丁西林之《酒后》的比较分析相映成趣(见《两性写作与女性在文本中的命运》)。它向我们表明,“女性写作”,并非仅仅基于一种生理差异或曰本质论的文化宿命,而是一种叙事立场与位置的选择,一种关于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反省与自觉。阿馨的论文向我们提示出“十七年”这一特定的时代及社会文化语境,在一个“妇女解放”、否定性别差异的主流话语之下,男性规范无疑是其中至为有力的权威。她对“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的分析成了一个有力的提示与说明。但在大部分“化妆为男人”写作的女作家作品中,性别间的权力关系,仍作为强有力的压抑机制在其间运作;而女作家的写作在认同、彷徨、微弱的拒斥之间,仍间或显露出性别写作的印痕,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成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女性的文化边缘。

事实上,正是这种坚实的理论基础、纤毫毕现的文本分析、隐忍而

热切的女性的社会情怀,成就了这一著作中阿馨的女性写作风格。其中另外两篇引人瞩目的论文,是《“夏娃”与“圣母”的祭献——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和《一种反控制的叙述——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前者从女性的“原型形象”入手,剖析了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写作中的文化地位。“她”更多地是作为“空洞的能指”,用以填充男性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历史指认与艺术想象;后者则在更为丰富的文本及其文化层面上,剖析了王安忆小说远为繁复的多重自指、内省中的“反控制叙述”,一种对男性经典话语及写作方式的颠覆与消解。

兴奋地通读了阿馨的文稿,再一次为汉语写作中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入与渐趋成熟而鼓舞。一种真正的理论的女性写作形态正在成形之中。如何将属于女性的、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理论的写作之中?如何使一种女性主义的视点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立场、一种痕迹?如何在接受他人/男性的学术规范、使用他人/男性的话语中实现“反控制的叙述”?我愿与阿馨共勉。

1994年5月8日

前言

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是非常广泛和复杂的一门学科或研究对象,任何研究者必须选择一个较为适合自己兴趣、所长和力所能及的范畴、角度、方法切入文本和进行理论概括。由于我的阅读积累、背景和性别,这几年我选择了叙事性较强的文学样式:小说、戏剧和叙事诗作为我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更为明显的,我选择了性别这个角度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大致可以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性别”作为一个角度或立场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也就是说,这种角度并非自然而然地出自女性(female)或男性(male),而是出自对性别的自觉,这一自觉包括对自身生理性别的认知和对社会界定的性别行为、角色的反思。作为社会产物的女人(woman)和男人(man),都可以通过这种认知和反思调整自己的性别视角。由于我在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之前,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认知和反思过程,因此当面对当代叙事话语的性别问题时,我的选择是很“自然”的。

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中的实践,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在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亦是一个新的现象。因此,借助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必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妇女运动在文化批判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末由伍尔夫(V. Woolf)的《一间自己的房间》^①开始,经过60年代末期的蓬勃成长,到今天克里斯多娃(J. Kristeva)等的语言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但把西方妇女运动带入一个新纪元,还给文学的注释和写作注入了新生命、开拓了新视角。

为了引领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主要采用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

^①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1929), Granada Publishing Ltd, London, Toronto, Sydney, New York, 1977.

以下我将对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根源和范畴作初步的评述和归纳,然后就我有限的研究经验讨论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可行性问题。

理论与理论化——英美派和法国派的比较

英国、美国和法国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大本营。英美派和法国派根据自己的妇女运动和学术走向情况,发展出两条不同的道路。英美派较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而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这与她们的社会批判方式是一致的。英美派注重女性本身的文学传统,因此,除了具体的批评和解释外,她们还致力于文学史方面的工作。她们发掘、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评价她们的意识发展,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妇女文学传统的建立,让女性“浮出历史地表”^①。据此,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肖瓦尔特(E. Showalter)将英美女性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模仿期(1840—1880)、反叛期(1880—1920)和自我发觉期(1920到现在)^②,这勾画了女性作家从隐姓埋名地跟男人一起写作,发展到对社会和文学进行批判,进而建立以女性自身的经验为基础的文学艺术的轨迹。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则倾向于对其他的批评理论如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进行批判,与此同时,亦从中吸收这些理论的可取部分发展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所以法国派的批评对象不仅是作品、作家或文学现象,亦涉及与女性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西方思潮和文论的阅读方法,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可以说,波伏娃(S. de Beauvoir)、西苏(H. Cixous)、依利格瑞(L. Irigaray)、克里斯多娃等法国主将与一些男性大师如弗洛伊德(S. Freud)、拉康(J. Lacan)、德里达(J. Derrida)、德曼(P. de Man)、萨特(J. P. Sartre)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既受他们影响,又对他们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质疑。法国派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在理论的建立方面,她们在这个层面上与男性理论权威进行交锋,表现了她们的气魄,也迫使文学界和理论界不能不正视女性主义批评的存在和重要性。

不过,在“理论化”的问题上,英美派和法国派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① 取自《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书名。

② Elaine Showalter, “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1985.

总的来说,英美派对“理论化”持怀疑态度。肖瓦尔特指出,在英国,女性主义批评除了被男性抨击为缺乏“学术诚意”和“严谨性”外,“理论化”的第二种阻碍来自妇女运动中的活动家。她们认为即使建立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所谓理论权威,其实也只是反映男性的观点、经验和取向,是具性别主义和欺骗性的,文学应以个人及社会环境作为生产和消费基础。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更视方法论本身是男权社会的学术工具,它规范了可质疑和可讨论的内容,更将女性问题全盘忽视,以致妇女没法根据自己的经验听取及构思问题。在美国,因为妇女学在学院和大学里极为普遍,有人担心女性主义分析会被学院派吸收,她们相信女性主义批评最大的力量在于其活动性和资料性,害怕一旦理论变得无懈可击,妇女运动就衰亡。^①肖瓦尔特认为这种防卫性的反应只是将女性参与理论讨论时面临的心理障碍合理化而已,她认为建立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不是向男性批评家卖账,更重要的是假如缺乏一种能清晰地说明自己的理论,女性主义就会不断受到抨击,结果只能被动防守而不能主动出击。

的确,当女性主义从社会批评进入更深层的文化批判的时候,面对的不仅是两性不平等的现象和争取具体权益的立论问题,更是造成这些表象和问题的整个文化系统。因而,在文化领域上的“破”与“立”的策略,已不能停留在行为和言论上,而是需要进入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象征秩序,这便非靠有说服力和创新性的理论不可。法国派在这方面似乎看得较为透彻。她们对理论的强调,一方面是受到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潮如解构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法国的妇女运动所作的“两代人”思考的结果。法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之一克里斯多娃在她的名篇《妇女的时间》中所提出的“两代人”,并非仅指历史的顺序,还是一个时空概念。她分辨了两代女性主义者的差别,第一代是争取与男性享有同等权益的平均主义女性主义者,她们是在“线状时间”(linear time)中争取拥有自己位置的权利。1968年后冒出的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则过分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致她们的争取目标处于历史和政治的线状时间之外。克里斯多娃认为在理论上必须解决男女对立二分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妇女运动的

① Elaine Showalter, "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1985.

要求,她期待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另一种空间)的出现。^①

其实,对理论的重视亦不限于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美国学院派的琼森(B. Johnson)、斯皮瓦克(G. C. Spivak)、雅克布斯(M. Jacobus)和肖瓦尔特均倾向法国派的立场,不同的是,她们较多从实际的现象出发,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则倾向从抽象的哲学角度入手。

破除阳具的象征在文学创作中的“霸权”位置

弗洛伊德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者均是不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对象,因为其对性的立论成为父权主义文学理论将妇女排拒于文学门外的最有力依据。吉尔伯特(S. Gilbert)和格芭(S.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她们率先对很多男性文学家的如下观念提出挑战:男性的性是文学力量的重心,笔是阳具的象征。“在西方的父权制度文化里,文本的作者是父亲、祖先、生殖者、美学之父,他的笔的威力,正如他的阳具的威力,不但具有创造生命的能力,而且还有繁殖后代的功能……故此是繁殖者,又是创造者。”^②这种父权/创造力的比喻还有深一层的意蕴,那就是妇女的存在只是供男人受用,是他们文学和肉欲的对象,所以妇女用笔杆不但不合适,而且实际上是冒犯之举。因此,妇女只可能成为“父亲”文本里的创造物,她变成他的财产,在他的语言之中不能翻身。这对女性的心理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除了拿不起笔以外,还不能摆脱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形象的阴影。吉尔伯特和格芭断言,文学中父权主义隐喻最终的矛盾在于作者同时创造及禁锢女性人物,在给予她们生命之同时将她们“杀死”。

将性与创造力联结一起的精神分析学鼻祖弗洛伊德认为妇女是“被动的、自我陶醉的、自我虐待和羡慕阳具的”^③。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进一步发展成为“镜象阶段”理论的拉康,亦是以阳具说明了性别差异的起源,父亲以代表法律的象征进入“镜子”之后,男孩的性别认同

① Juliet Kristeva, "Women's Time", *The Kristeva Reader*, Toril Moi Ed.,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 1986.

② 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Queen's Looking Glass: Female Creativity, Male Images of Women, and the Metaphor of Literary Paternity",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Yale U. Press, 1984.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精神分析》,《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3、270页。

便转向父亲,他因为拥有阳具而承继父亲的权威地位。相反女孩则发现其是阳具的缺乏者而自动被“阉割”,永远成为残缺的人,终身只得恋慕或嫉忌男人(阳具),犹如其母亲一样失去了主体位置。这种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压迫性,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目标,因为“拉康所写的象征秩序实际上是现代阶级社会中家长式的性别和社会秩序,围绕着阳具的‘抽象表现符号’而构成,并受到父亲体现的法律所支配”。^① 例如,克里斯多娃期望把符号学的语言作为破坏象征秩序的方式之一。

斯皮瓦克亦对弗洛伊德的阳具中心论提出批评:“弗洛伊德最有名的一种说法是女性特质就在于羡慕阳具。……这里,弗洛伊德开始辩论说在未发现自己的性时,小女孩其实是一名小男孩。正如露丝·依利格瑞及他人所提出的,弗洛伊德并没有将子宫看成一回事。我们的情绪应该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体内有子宫和受过子宫的孕育。我们可能可以以‘羡慕子宫’(womb-envy)来创造意识的理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均回避了子宫是生产的地方这个想法……对弗洛伊德来说,最卓越的生殖器是阳具而不是阴蒂和阴道。”^② 针对漠视女性的性的问题,斯皮瓦克提出重写弗洛伊德文本的需要,她的策略不在于宣布“羡慕阳具”这一想法完全不能接受,而是提出“羡慕子宫”这个想法,好能平衡人们在女性和社会生产上一面倒的看法。^③

诚然,斯皮瓦克提出重写弗洛伊德文本、提出正视女性的性是有别于男性的性是勇敢和重要的,但是,这会陷入理论上的模仿的危险,正如早期女作家模仿男性写作一样。斯皮瓦克的“羡慕子宫”的想法,反映了她不自觉(也许是自觉的)地进入了这个游戏,或者可以说是还未能打破男性理论家的思维方式。因为在同一个逻辑推理下,如果男性需要羡慕子宫的话,他必被认为在发展性别认同的过程中有某方面的“残缺”。斯皮瓦克没有具体说明羡慕子宫的意蕴,在象征意义上,这种提法也未能达到颠覆秩序的效果。由于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女性主义批评家还未能发展一套能够破除阳具中心的理论,它的“霸权”位置可以说是未被根本地动摇的。如何建立一套能表现两性既独立(即有差异)而又需互相依存的关系的理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精神分析》,《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33、270页。

②③ G. C.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